

地球本來就是圓的

楊鳴章

昔日十字架矗立的西方國家的崇山尖，寶塔莊嚴的東方世界的峻嶺頂，現已為衛星接收器及電訊發射站所佔有。走到街上看一看，戴Walkman的人愈來愈多，而戴眼鏡的人相對而言則愈來愈少。形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我相信是現在的人喜歡用耳去接收訊息多於用眼。用耳接收訊息，過程顯然簡單直接，用眼則比較複雜和緩慢，因為起碼要經過一個消化的過程。棄繁就簡是人之常情，特別是現代都市人的常情，也就無怪乎大家都捨書報而就Walkman。

比較一下中、西兩方面的文化，怎樣看都是中國發展得早：造紙、印刷、天文、地理、軍事、醫藥……，可是今天反倒要「禮失求諸野」，引進西方的科技、理論和思想，以補自己的不足，是否也關乎我們的文化所應用的文字的不同？

中國文化表達所用的工具……方塊字，基本上是由圖案拼砌而成的表意文字，每字一音。就字體結構而言，雖

然表意文字在認知、感受上的深刻程度遠勝表音文字，比方說「明」、「愛」兩個字，我們不但可在字音上感受，更可從字形、字義上瞭解，明顯地比單從“CARITAS”這個拉丁字獲得的多；可是，在接收、表達、運用和反應的速度與靈活方面而言，表意文字卻又顯然有它困難的地方。我們許多人不都會有執筆忘字的經驗嗎？說得出某個字，常常想不起它應該如何書寫。讀書人自幼一字一字的學習，積久記誦，別無捷徑。一遇到僻字，若無人傳授，即難以運用。

魏晉後漢文受梵文拼音法的影響，採用反切法，兩字旁注，上為變聲，下為疊韻，聲母、韻母配合，得其音質；可是卻又因地方方言不同而異，而且各家所用反切字往往不能統一；標準既不能確立，學者自然不知所從，大大的阻礙了學習的速度。明清之際，利瑪竇來華曾作羅馬字注音四篇贈中國學者；及至金尼閣，更進而用西方拼音法解釋中國文字的音韻道理，從而將拼音法具體地納入中國音韻學的範圍內，除了幫助西方人士研究漢學之外，實在也使中國文字學得到拼讀的便宜。

傳統上我們對文字書寫有一種近乎崇拜的依賴。中國儒家文化不鼓勵人多說話，認為「吉人辭寡、躁人辭繁」，「剛毅木訥近仁」，我們尊重的是文字優雅、用辭恰當、書法秀麗的人，千年以來能光宗耀祖、為國為民也全靠一管筆——經科學與考試而金榜題名。於是我們就愈來愈不習慣，然後愈來愈不懂用語言表達較高層次的內容。西方人士開會，人人口若懸河，勇於表達意見；中國

人開會，個個正襟危坐、沉默是金、誰也不願說話，即使開口，也大都是支支吾吾、期期艾艾、不成系統。其實，發揮「視覺文化」腦細胞的同時，也深入的發揮「聽覺文化」腦細胞並不一定會顧此失彼，反會相得益彰，我們的腦袋本來就是圓的。

西方文化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直至今天高等學府的教學方法，仍極大部份地著重討論和辯證，連博士論文的最後一關，也不脫對話的本質。在我們這世界已經進展到非靠知識學問不能好好生存的境界，而且由於文化世界性的發展，知識學問的深度、廣度，都大大增加，迅速的新陳代謝。我們學習西方文化、思想方法、教育制度等，不單是為「利用」和「厚生」，也是為「正德」；不單是為致用，也是為了要使我們的學習能力加倍的提升和全面的發展。

清末民初，胡適提倡白話文，吳稚暉提倡注音字，蔡元培的新思想運動實質上是中國的一次「文藝復興」，雖然他們對一切的舊有皆加以價值上的重估是否正確，也不是沒有斟酌的餘地，但到底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文化，也促進了我們對西方文化、藝術、科技、甚至宗教信仰的認識。不管過去我們曾在改革過程中受到怎麼樣的災難和恥辱，但人總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恆常盤踞在自己的蝸居內。要消弭因背景不同、了解有別的種種誤會與紛爭，教育與人力的栽培必須繼續，而且須從「全球化」這宏觀角度著墨，否則許多發展始終是緩慢的及在低層次中糾纏不清。今日國家的改革開放，除了借外面人的力量前來和我

們共同開發經濟市場，是否也更應藉此契機，在教育層面再一次沖擊我們的思想方法？

教會曾在中國辦學，基督教的馬禮遜所創辦的英華書院，天主教修會所創辦的徐匯公學、震旦大學、工商學院、輔仁大學等，其他還有數以千計的初等學校和文理學校都無疑對中國的教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教會本來就有一份更新世界的使命，這使命關乎建設社會、促進文化、實現正義和平與仁愛的理想。要使這理想茁壯起來，除了需要靜態的見證，也需要鼓勵和促進溝通；在發揮「地鹽、世光」的使命同時，也需要深入的再探索一下投資發展人力資源的空間。曾經和政治牽絆在一起的教會，今日既強調僕人與橋樑的角色，尤其在新中國，完全沒有權力架構的支持，是否應再一次在教育及文化溝通方面承擔一份角色？而且正因為沒有權力架構的支持，才能顯得她的服務就是為了服務，她的服務才能得到淨化。從思想學習官能的全面發展，跳躍到教會的使命是否步伐太大？但教會的存在本來就是普世性的，正如地球本來就是圓的。



楊鳴章神父：現任香港明愛教育服務部部長。